

方志、族譜、碑刻、文史資料和非文字化的口述歷史、物化符號等。這些材料不僅被置入田野現場進行解讀，還被落實到村落空間與日常生活，國家、市場這兩種缺乏溫度的地方社會塑造力量，在地方人群的日常生活與喜怒哀樂中被細緻呈現，對人們情感世界和性別問題的關注則顯示出女性學者獨到的細膩特質。

本書更加值得稱道的是其反思性和寫作方式。一如作者所言，「歷史人類學是對歷史本質的反思，這包括以異文化、他者的歷史觀點來質疑本文化、自身的歷史概念，也體現為人類學的文化論與歷史學的過程論的協調」（頁306）。深入的田野工作使得研究者很自然地立足當下去審視歷史，而去追尋歷史之於地方人群的意義，進而反思我們自己對「歷史」的理解。這樣的理念之下，看起來頗為僵硬的「空間」成為一個歷史敘事方式，其概念亦得以延展。在寫作方面，作者聲稱：「既然不可能在歷史與文本之間『製造』出一致，那麼便從缺失出發，努力來呈現一切。」（頁299）歷史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常常讓研究者陷入困惑，傳統史學研究孜孜以求的「真相」更是撲朔迷離，以至有學者轉而關注幫助我們理解歷史的「凹凸鏡」（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15）。因此，本書作者拒絕採用線性運動的時間序列為書寫歷史的方式，而以多元的視角呈現不同的「歷史的鏡像」。

吳曉美

吉首大學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付海晏，《北京白雲觀與近代中國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305頁。

北京白雲觀作為全真龍門的祖庭，在道教史上地位顯赫，並且歷來受到各方高度重視，20世紀20年代以來有諸多學者對之進行研究。然而對於近代白雲觀而言，仍有不少黑洞值得深究。付海晏歷經十年深耕，完成《北京白雲觀與近代中國社會》一書。此書以作者所盡力收集到的近代白雲觀史料檔案為基礎，力圖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放寬視野，更全面地探究白雲觀在近代中國社會的角色和豐富面相，更深入地審視近代中國政治、宗教與社會間的複雜關係。

此書內容結構除導論、結論外，共有五章。導論部份對白雲觀的相關研究進行學術史回顧，概述先行研究的貢獻及缺憾，進而指出此書力圖探討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第一章，作者說明是以宗教史、政治史、社會生活史三個路徑審視白雲觀在晚清社會的角色，實則三個路徑不是畛域有別平行關係，此章在行文中也着力呈現出此中政治、宗教、社會、文化等種種因素緊密交織、相互作用的面相。晚清白雲觀宮觀拓展，香火和觀產增多，傳戒活動極為頻繁，以上現象昭示着全真龍門派聲勢的高漲；而全真龍門的興盛與權貴信眾的扶持密不可分，如劉素雲、完顏家族、素霍拉氏家族、奕繪、顧太清、果親王等，積極捐資、護法支持，尤其是劉素雲重勒碑刻強化白雲觀歷史與宗教認同、開創霍山派極大助長龍門聲勢。晚清白雲觀與政治的密切聯繫，不僅體現在權貴信徒對白雲觀的扶持上，白雲觀對政壇的影響也不容小覷：由於與劉素雲是同戒戚友，方丈高仁峒和李蓮英、慈禧關係密切，因之得以勾結內廷、賣官鬻爵，甚至對中俄交涉等對外關係層面產生影響。白雲觀方丈高仁峒的身份角色複雜性也因此被充份揭示，作者利用鮮被學界注意的《雲水集》及野史、小說、報章雜誌、日本外交檔案等史料，發現高仁峒是「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是「雅士亦是俗人」，其善於書畫，推崇三教，卻也不免破戒流俗；其身為老道，但社交網絡極為廣泛複雜，甚至游走於清廷內政外交之間。晚清白雲觀對於各個身份社群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間，政要權貴捐資扶持，文人名流雅集於此，普通信眾熱衷參與廟會、「燕九節」、「賽馬」等活動，可見白雲觀的功能與影響力遠遠不止於信仰層面，寺廟對於晚清城市社會文化的重要性從中可見一斑。

第二章首先從創立中央道教會、三次傳戒、整修宮觀、做慈善、重印道藏等方面探討住持陳明霽對民初白雲觀的維持作用，尤其強調1912中央道教會的成立是民國創立後道教改革之先聲，儘管之後道教會「無疾而終」，但道教改革的內在趨勢與動力由此而生，並促使組織道教社團成為近代道教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作者進而利用豐厚的史料從信眾網絡、物質與精神生活、大眾媒體形塑等層面呈現出民初白雲觀的多元面相——民初白雲觀信眾網絡廣泛，北京政商名流、遜清內宮、晚清遺老，甚至喇嘛、伶人都與白雲觀聯繫密切；關於物質和精神生活層面，作者採用少有人注意的1936年社會局寺廟調查表檔案還原白雲觀不動產狀況，藉助1936年白雲觀「經典書畫類」統計資料、陳明霽《白雲集》等史料初步呈現民初白雲觀道士的精神世界；民初以來游記、報章雜誌對白雲觀負面化報導內容增多，白雲觀形象也

借由媒體被重新認知和塑造，作者認為這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民國以來陳明霖及白雲觀在近代道教改革中的重要努力和成效。

第三章以相關檔案為基礎，詳細還原20世紀30年代白雲觀兩次住持危機的經過。第一次危機發生在1930年6月，住持陳明霖因未遵守社會局限期登記的指令而被革職，最終被迫認捐才得以復職；第二次危機發生在1936年，陳明霖病卒，圍繞安世霖繼任住持資格產生一系列波折，雖然安世霖不符合擔任住持慣例之處諸多，但由於寺廟登記迫切、重要權貴人物從中幫忙（王坦、江朝宗），社會局同意安世霖以監院身份代理主持，而這卻為安世霖的悲劇埋下禍根。此章透過白雲觀兩次住持危機，得以深入審視在衰敗過程中白雲觀內部的複雜矛盾，有助於深入理解近代中國政教關係。值得一提的是，在關注《監督寺廟條例》的同時，作者還體察到常被學者忽視的《寺廟登記條例》、《寺廟登記規則》在近代國家宗教控制事物中的重要角色。白雲觀的兩次住持危機一方面反映國民政府在貫徹《寺廟登記條例》、實踐管理宗教的努力，而另一方面陳明霖認捐被放、安世霖成功代理住持的事例也透露出國民政府無意在管理宗教方面走得太遠，政府不是通過對寺廟的整改實現宗教的復興，而僅是因應一時的利益考量、以樹立管理宗教的權威為目的，因此可見「在建立現代性國家的過程中，道觀被打上了國家嚴格控制以及管理不善的政治烙印」（頁182）。

1940年安世霖頒佈的《白雲觀全真道範》和日本學者吉岡義豐的《白雲觀の道教》，較少被學者注意，實則其對於考察20世紀40年代白雲觀具有重要意義。第四章即是在如上兩種史料的基礎上，對安世霖改革白雲觀進行細緻研究。此章詳細梳理安世霖在革新道觀組織體系（方丈監院住持推選、組織綱目、清規、修道程序）、設立道士教育班、改革宮觀管理制度和經濟制度方面的措施，從中反映出安世霖對於現代宮觀制度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細究安世霖改革的目的，除了重建宮觀秩序、振興宗風外，很大程度上符合安氏反對者所說、是出於其加強對白雲觀控制的考慮；安世霖改革目的並非出於公心，其個人最終也遭受悲慘結局，但其制定的《全真道範》卻或多或少被繼承，並對白雲觀甚至道教史產生深遠影響，然而隨着安世霖本人的身敗名裂，其推行改革也被遺忘。

1946年白雲觀住持安世霖及督管白全一被活活燒死，作者研究白雲觀的起因即是源於十餘年前閱讀到這一事件的檔案。第五章在相關檔案的基礎上細緻梳理1940年代白雲觀的糾紛和1946年安世霖被燒死的慘案緣起、經過、結果，並就此延伸視野，深入審視近代中國變動社會中的道士、道觀、道教

及其與政治的關係。作者認為，安世霖慘案是1940年代以來白雲觀內部矛盾衝突不斷激化的結果，涉及近代道教派系衝突、廟產糾紛等問題，並且與近代國家宗教管理、清規與法律等問題密切相關，「這不僅是安世霖的悲劇，也是變動時代下白雲觀乃至中國道教衰敗最典型象徵之一」（頁227）。

此書對近代白雲觀的深入研究是建立在扎實而豐厚的史料基礎上，除了中日文檔案、文集日記、宮觀志、碑刻、報章雜誌、小說野史、游記、竹枝詞等之外，還難能可貴地注意到教內文獻《白雲觀全真道範》、《雲水集》以及《寺廟登記表》的重要意義，從而有助於更深刻認知近代白雲觀的物質精神世界及政教關係。

全書在幾處提到近代道教衰退的問題，雖未對之進行直接探討，但實則有助於讀者反思這一議題。一方面白雲觀的兩次住持危機、長時段持續的派系之爭、安世霖被燒死的悲劇，以及大眾媒體日漸負面化的報導，呈現近代白雲觀、近代道教衰退的特徵；然而另一方面，晚清民初白雲觀作為城市社會文化的重要公共空間，各種社群持續參與其中，並擁有廣泛信眾網絡，又昭示白雲觀並非是暗淡衰落的。因此這提醒我們謹慎對待和反思近代道教「衰退」與否的論調，不輕易對其進行價值評判，而將眼光更多地投向認知近代道教發展中呈現的複雜面貌。

既有的近代道教研究對於經典文本、思想義理、儀式軌範等方面極為重視，相較之下對於宗教在社會、政治等層面的關注卻太少，對於宮觀、道士的研究也不夠立體、豐滿，忽視宗教在歷史中的複雜面相。此書以近代白雲觀為研究對象，卻並未囿於白雲觀而研究白雲觀，並未囿於道教史而言道教史，而是將白雲觀置於晚清、民國時代語境之下，深入審視其豐富的歷史樣態；更立體豐滿地考察近代白雲觀三位重要道士高仁峒、陳明霖、安世霖的身份角色，充份關注其宗教作為、社會交往、政治聯繫、物質與精神世界等維度，從而更深入審視近代白雲觀的角色功能及其在近代中國時代背景下與政治、社會、文化的緊密交織關係。

劉翔宇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